

全书主编 张国祚

中华 骄子

史学巨擘

● 主编 瞿林东

● 龍門書局



中华骄子
史学巨擘

主编 瞿林东

龍門書局

1995

(京)新登字 306 号

41-38/03
内 容 简 介

自古以来，中国史学家层出不穷，为世界各国所仅见。本书从众多的史学家中遴选出史学巨擘 35 人，上起司马迁、班固，下迄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阐述他们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成就与贡献。并约略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撰述内容和多种表现形式等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和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显示出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和民族特色。本书可作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材，也可供爱好历史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中 华 骄 子
史 学 巨 擘

主 编 瞿 林 东
责任编辑 陈雨春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4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7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6%
印数：5501—16000 字数：170 000

ISBN 7-80111-031-5/Z·27

定价：6.80元

《中华骄子》编委会

主 编 张国祚

副主编 周溯源 王渝生 萧少秋

名誉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振海	邓广铭	王 淇	王梓坤
冰 心	陈久金	张作耀	张岱年
张 健	张海涛	张静如	李希凡
李景瑞	侯树栋	郭传杰	席泽宗
陶德麟	龚书铎	黄楠森	董芳明
臧克家	戴 逸	魏 巍	

编 委

张国祚	周溯源	王渝生	萧少秋
杨 岭	何伟华	陈雨春	刘重日
瞿林东	张海鹏	戴文忠	夏春平
刘继贤	杨胜群	李 蓉	徐安德
赵 军	黄华昌	黄振春	温仲玉
张瑞山	马宝珠	廖育群	杨志超
周桂钿	董书城	王利娟	

数千古人杰伟业 开万代风流新篇

——《中华骄子》总序

张 国 祚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团结和激励炎黄儿女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孕育出灿若繁星般的各类优秀人物，为中华民族的昌盛，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优秀人物就是值得炎黄儿女引为自豪的“中华骄子”。挖掘和整理自古以来“中华骄子”的辉煌业绩，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展示“中华骄子”的风采，树立中华民族的高大形象，激发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为研究、评价和宣传优秀历史人物开辟一条新思路，建构一个新体系，这就是编撰《中华骄子》的宗旨。

在建构新体系时，首先面临三个不可避免且比较艰难的问题：其一，如何设立书目；其二，如何界定“骄子”；其三，如何给“骄子”分类归卷。针对这三个问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我们确定了三条总的原则。

一曰：需实兼备。“需”即需要。古为今用，是我们研究历史时应该提倡的一个目的。以史为鉴，从优秀历史人物中为今人遴选出值得敬佩和学习的楷模，这是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本书编撰的需要。“实”即实际。以客观实际为据，坚持实事求是。有哪方面的骄子，设哪方面书目，所写骄子，必须有客观原型和翔实资料。所谓“需实兼备”，即力求做到思想性

• i •

与客观性统一，文学性与史学性统一，趣味性与科学性统一，可读性与学术性统一。

二曰：白璧允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便杰出人物也难免存在缺点和失误，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因微瑕而掩玉美，更不要因微瑕而否玉美。对于骄子，既要突出其所以成为骄子的感人业绩，又要评价得恰如其分。有鉴于此，凡选入本书的骄子，或取其主流，或取其大节，或取其晚节；对其历史贡献和正面影响，渲以浓墨。对其“瑕”，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下，亦适当点到，以作后人之鉴。

三曰：角色取优。社会历史是个复杂的大系统，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受到各种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其社会实践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角色，骄子也不例外。骄子哪方面堪称为骄子，就取其哪方面角色选入本书。若其多方面角色均堪称为骄子，则取其最重要、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角色选入本书相应的卷。

遵循上述三条总的原则，并考虑到兼顾历史与现实，我们从数以万计有文献可考的中华古今人物中遴选出近千位骄子，共分26卷。书目如下：《革命伟人》、《民族英雄》、《农民领袖》、《辛亥烈士》、《红色英灵》、《思想先哲》、《改革先驱》、《卓越使者》、《军事奇才》、《治世能臣》、《廉洁楷模》、《侠义勇士》、《著名帝王》、《天文泰斗》、《数学大师》、《农神水伯》、《医圣药王》、《奇工巨匠》、《史学巨擘》、《文学名家》、《艺术名流》、《实业元勋》、《体坛明星》、《港台名人》、《海外华杰》、《归国英才》。这26卷构成了《中华骄子》体系的整体框架。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放眼全球，环顾今日，正是中华民族骄子辈出的伟大时代。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各种领域，都活跃着我们民族引为自豪的骄子。但是，由于资料不全，条件有限，除《革命伟人》、《侠义勇士》、《体坛明星》、《港台名人》、《海外华杰》和《归国英才》等六卷之外，本书只收入了已故的“骄子”。在资料齐备，条件成熟时，我们考虑出版上述26卷的续

史学百壁

编，增设《劳动英模》、《民主仁人》、《千秋功臣》等新卷。

纵览《中华骄子》各卷，所载杰出人物，才思神勇，千姿百态，读者可从中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民族具有热爱祖国的高贵品格，能智能勇的卓越才能，顶天立地的伟岸丰姿，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万劫不灭的勃勃生机。读者可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登临长城而望“城”兴叹？为什么国际竞争对手面对重新崛起的中华而惊呼“醒狮”？为什么某些预言家大谈“21世纪将是华人称雄天下的世纪”？愿本书能使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伴随往昔杰出人物震撼人心的足音旋律，争做无愧历史重托的时代风流，不断为《中华骄子》增添新的篇章。

本书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大型人物图书，其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之广，系统分类之全、遴选标准之高、分类归卷之难、撰写要求之严，在同类书籍中实属仅见。许多功底深厚、学识渊博、深孚众望的老专家、老学者给予本书以热心的关注和支持；许多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勇于开拓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本书的编撰。如果没有史学界、哲学界、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军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众多专家学者卓有成效的密切合作，完成这样一部巨著是难以想象的。特别应该指出，龙门书局在复出伊始、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便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而郑重推出26卷本的《中华骄子》，可见方向明、气魄大，功不可没。

由于撰写时间短、任务重，本书在体系结构、遴选取舍、史料考证、评价分寸、写作风格等方面，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1994年8月于北京

卷 首 语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层出不穷，历史文献繁富、连贯、有序，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史学家对于历史撰述的求实与经世的重视，对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重视，对于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砥砺史学主体的重视等，即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本卷对于浩瀚、辉煌的中国史学，虽只粗粗地勾勒几笔，而仍企盼再现一些杰出史学家的风貌、著作及其在中国史学上的位置。这里所记 35 位史家，从司马迁到吴晗，约略反映出中国史学所走过的历程；从王国维以上、范文澜以下各篇，大致可见这个历程的阶段性。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梁启超和郭沫若，是中国史学发展上各阶段的总结性人物或开创性人物，因已分别为他卷所收，本卷只好割爱，但他们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是必须在这里予以说明的。

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几认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章学诚力主“别识心裁”，他们都推崇史学家的创造性。本卷所收史家，虽古今悬隔，旨趣迥然，但谓之“史学巨擘”，均可当之无愧。

目 录

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	1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开创者刘向	8
撰写第一部纪传体皇朝史的班固	14
第一部编年体皇朝史的作者荀悦	20
总揽全局的良史之才陈寿	25
以著史扶明义教的袁宏	30
具有异端品格的杰出史家范曄	35
文史兼长的沈约	41
开创少数民族“正史”撰述的魏收	46
唐初史学的开创者令狐德棻	51
通叙南北归一统的李延寿	57
新的自觉精神的启迪者刘知几	62
为施政而编纂典制史的杜佑	68
资治与求实结合的典范司马光	73
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郑樵	79
宋代的近现代史专家李焘	85
钞书而成创作的袁枢	91
通考古代文献的马端临	98
明史撰述的开创者王世贞	104
以布衣撰订一代“正史”的万斯同	109
商榷前史品藻得失的王鸣盛	114
于考史之中以评论见长的赵翼	120
乾嘉考史学派的旗帜钱大昕	126

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	132
独行于世的疑古先驱崔述	138
从旧史学走向新史学的王国维	146
博学深思别具慧眼的陈垣	152
精于考据富于卓识的陈寅恪	157
力图执史学之风气的胡适	163
疑古与考信的史学大师顾颉刚	169
开辟通史撰述新道路的范文澜	175
为史学的科学性不懈奋斗的翦伯赞	181
感于历史使命而治史的吕振羽	187
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大师侯外庐	193
杰出的大众史学倡导者吴晗	199

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在传统史学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去世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职司天文，记录史事。司马谈曾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周易》，向黄子学习道论，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司马谈所作《论六家要指》，以简炼的文字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术的短长，是古代学术史上一篇重要论文。这样的家庭，对司马迁的博学多才及立志于史学事业，有着直接影响。

司马迁小时候在家乡耕作放牧，过着田园生活。10岁开始诵读古文，以后又向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经学，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底。20岁时为了印证读书所得，并访求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走出书房，漫游祖国河山。他到过会稽，寻找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记录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拜访萧何、曹参、樊哙的故宅；到过大梁，观看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亲临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访问孟尝君的封邑；还来到汶水、泗水之间，走访孔子的故乡，参观孔子庙堂里的车服、礼器；此外，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最后返回长安。这次游历大约历时3—4年。祖国的壮美河山，开阔了司马迁的胸怀，增进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也进一步激发了他敏锐的审美意识，于是，在他笔下写出《史记》这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毫不奇怪了。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司马迁被选任郎中，这是个侍从性质的小官。几年后，汉武帝派他出使西南边疆，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司马迁远行巴蜀以南，直到昆明一带。

司马迁返回时，他的父亲病倒在洛阳。当时汉武帝正在举行封泰山的大典，司马谈没有能够参加，于是病至不起。司马迁赶到洛阳探望父亲。司马谈拉着他的手殷切叮嘱他要继承先辈事业，完成自己的遗作，记录下大汉一统功业和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痛哭流涕地向父亲立下了绝不辜负他的期望的誓言。

司马谈去世后3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正式开始了史官生涯。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他广览皇家藏书，辛勤搜集材料，经过5年的努力准备，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的写作。这一年，他主持改制的太初历开始使用。当时太史令的职责有二：一是观测天象，掌管历法；二是记录朝廷的历史活动。司马迁主持的历法得以施行，这在他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其兴奋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接下来，他就要完成另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撰写史书了。他撰写《史记》是继承父亲遗志，更是为了完成继《春秋》而作的宏图大业。他自己说：周公死后500年有孔子，孔子到现在又有500年了，阐明王道，树立《易传》，继承《春秋》，撮取《诗》、《书》、《礼》、《乐》之义，不正是时候吗？我怎么敢推让呢？在当时“顺天应人”绝不是一句空话，司马迁选择这一年开始《史记》的撰写，是有深意的。

正在专心著述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去攻打匈奴，在未遇匈奴主力的情况下，大败而归。李广利部将李陵率5000步兵，被匈奴30000骑兵包围，血战几天几夜，杀伤大量匈奴兵士。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这一来，汉武帝正好拿李陵之罪转移人们的视线。正直的司马迁看下去，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谁知惹得武帝大怒，竟问了他个死罪。根据当时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可以交50万钱赎罪，也可

以受腐刑而免死。司马迁家中素无积蓄，拿不出钱来，在关键时刻，亲朋好友又不肯出来相救，他面对的只有或受辱、或被处死两种选择。在生死交关的时刻，他想一死了之，可是撰史的宏愿就将付之东流。但接受宫刑，又实在是人间最难忍受的耻辱。这时古代圣贤因困厄而发愤，最后取得成功的事例，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他下定了决心：死并不难，背负耻辱、接受人生的挑战，才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就是再大的代价，他也情愿付出。于是他接受了宫刑。这一人生变故，使司马迁的心灵受到巨大触动，对于人生、对于社会，他有了更深的体验、更深的思考，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体验、这思考、这理解，渗透于《史记》的字里行间。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他已经50岁了，受刑后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为了早日撰成《史记》，他顽强地工作着。太始四年，他终于基本完成了他的巨著《史记》，了却他的终生心愿。至此，他对人生再也没有什么牵挂，加上常年郁郁寡欢，大约在3年后，他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通史。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记事从远古的传说时代直至汉武帝天汉年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明自己撰写《史记》的旨趣，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史记》的内容和价值来看，他的这一目的是很好实现了。

对司马迁所说的一家之言，可以有两个理解：一是成就一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二是在思想上阐发出他自己对历史的独到见解。而在这两方面，《史记》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5大部分组成。本纪按年代记载大事，是全书的大纲；表用谱牒形式条理史实；书记载典章制度等，具有专史性质；列传记载人物或不适宜放到其他部分的史实；世家兼具编年、列传两种形式，专

记诸侯及重大人物之事。后4种体裁是全书的细目，也是对本纪的补充。司马迁创造了这5种体裁，又把这5种体裁熔于一炉，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创建了全新的综合性的史体——纪传体。纪传体宏大的规模和全面赅备的表现形式，与封建一统政权的规模气度，甚至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它能从多侧面反映社会历史全貌，其容量之大，表现力之丰富，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无法相比的。司马迁适应社会格局的变化，为记述中国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

《史记》、《汉书》之后，纪传体成为中国史书中的“正史”，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历代踵续而成的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史学的脊梁。

《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在纵的方面，它的时间跨越3000年。在横的方面，它记载了中原地区以至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东至大海这一广阔地域上各民族及各地方政权的历史活动。在记述范围上，它囊括了社会历史几乎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所记人物包括社会各阶层。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游侠、卜者、医生，以至农工商贾都在书中得到反映。这样广阔时空内的丰富内容，又使《史记》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

司马迁写《史记》贯彻了实录原则。对于汉代帝王，他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敢于指出他们的缺点。他笔下的汉高祖，是个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却不时露出贪财、好色、自私的流氓本相。对当时正在位的汉武帝，司马迁既写他雄才大略、巩固大一统政权的功绩，也写他大兴功业，造成天下凋敝的过失。司马迁恣情奋笔、无所阿容的精神，得到后代史家的赞赏。为了达到记载上的真实，司马迁还非常注意对史料的搜罗、考订、鉴别，经常采用实际调查得来的材料。因此，《史记》一直被看作一部信史，成为研究先秦及秦汉史的基本材料。

《史记》的语言简洁、生动、顺畅、传神，在铺陈形势、描写场面、摹写战争、塑造人物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它的

各个表序都能用简练明快的笔法，把历史变化大势清晰地勾勒出来。《项羽本纪》中描写鸿门宴一节，把故事叙述得曲折、生动、紧张，再加上呼之欲出的人物动作、神态、语言，造成了身临其境的效果。它写战争非常逼真，能把战争的宏大场面、激战情景、紧张气氛及参战人员的士气、斗志如实地描绘出来。《史记》中记述了几百个历史人物，个个形象丰满，栩栩如生。通过细节揭示人物特点，以至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是《史记》的特长。《万石张叔列传》写景、武时期的一些大臣，个个“谨慎”。身为太仆的石庆，随武帝出驾，武帝问驾车有几匹马。这本来是随口可以回答上来的，石庆却用马鞭细数一遍，才小心禀告：皇上，有六匹马。这个细节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官吏的谨小慎微和君主专制下的官场风气。《史记》还善于寓论断于序事，即不使用褒贬之词，在叙事过程中就表述出对此的价值判断。这个方法丰富了史书的表现能力，可惜古往今来能运用自如的竟罕闻其人。《史记》高度的文学成就，也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与《汉书》作为汉代散文的范本，哺育了历代的文学家与文史爱好者。

《史记》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这是它具有永久魅力的关键所在。

天人关系是当时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司马迁对此作出很好回答。他不赞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力图把天和剥离开。他经常把天赋予自然的含义，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天道的根本。人们应该顺应这种自然变化，采取适当行为措施。他有时还把天看作“势”或“时”，其实就是一种在客观条件作用下发生的变化趋势。他论证天并不具备惩恶劝善功能，他举出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例子，反问：为什么有的人作恶多端，却累世富贵；有的人品行端正，却多遭厄运，不得善终？如果说天是赏善罚恶的，那么从这件事上看，所谓的天道到底还有没有个是非呢？他认为人事才是决定世事的关键。他写秦亡汉兴、写楚汉相争都把人事、人谋放在决定地位。他批评项羽残暴不仁，刚愎自用，不会使用人才，决策屡屡失误，导致最后失败，可临死时还

不知道反省自己，反倒埋怨是老天让他灭亡，真是大错特错！司马迁敬佩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着力记述他们的行为如何在关键时刻扭转局势、决定成败，是同神意史观的一种对抗。司马迁对阴阳五行学说多次进行批驳，指出他们的语言“闳大不经”、“使人拘而多畏”，却没有什么实际效验。对于求仙、祭祀等迷信活动，《史记》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批判。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汉武帝希图求仙得道，一次次被术士们愚弄，仍执迷不悟的可笑行为作了详尽记述，讽刺之深刻，入木三分。

对于古今历史变化，司马迁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而且是发展的。书中的十表是最大限度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每一个表都写出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写它在历史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合起来，就是一部从周晚年直到汉代悠久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史。基于历史发展变化观点，他赞成顺应历史趋势的变革措施，对于吴起、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的功劳，他都作了充分肯定。可贵的是，司马迁在书中使用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等历史考察方法，力图从变化的历史中总结出“成败兴坏之理”，使他的历史记述具有了哲理性的要求。而在书中他确实总结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史记》真正达到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

《史记》在对政治、经济的记述中，阐发了许多闪烁着理性光辉的见解。书中指出封建法律不过是帝王手中任意摆弄的工具，残民以逞的酷吏只要揣摩好帝王的意图，就可以把法律玩于股掌之上，至于平民百姓就只好成为他们的俎上之肉，任其宰割了。它揭露封建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实质：窃钩者被诛杀，窃国者被封侯，仁义只存在于侯王之家。司马迁看到了社会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礼义廉耻等行为规范，都要有物质基础做根本保证。他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的，指出富有是人的自然性情，是不用学就具有的欲望。他道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本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还上升到理论高度揭示财富的作用，指出财富越多社会地位就越

高，对别人的役使程度也就越深，这是自然的道理。这些看法超出了儒家思想藩篱，具有异端色彩，在思想史、史学史上产生了持久的积极影响。

（许殿才）